

李致文存

LIZHI WENCUN

第三卷

我与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致文存

Lizhi Wencun

第三卷

我与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出版. 第三卷 / 李致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6

(李致文存)

ISBN 978-7-220-11025-2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出版工作—四川—文集
IV. ①G239.27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57276号

WO YU CHUBAN

我与出版

李致文存 (第三卷)

出品人
项目统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谢 雪
张 丹
张 妮
戴雨虹
袁晓红
李 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60mm × 238mm
27.5
360 千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1025-2
1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李 | 致 | 文 | 存
我 与 出 版



80年代初，李致于盐道街3号四川人民出版社大院

· 总序 ·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

廖全京

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
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
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

这里面包含着 he 过去岁月的所有时光。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

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
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钱穆关于读《论语》是学
习“做人”的看法，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传统的遵
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传统已经随同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意
识即孔孟儒学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
活以及精神领域的导向和规范。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
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
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
程度地显露出来。自然，在漫长的传统浸润与新潮冲击的矛盾过程
中，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正

001

所谓“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尤其是在主张冲破世俗的道德规范、抵御旧的社会道德戒律对个体的人的压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陆续登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对如何做人的各种回答呈现出来的新旧矛盾的冲撞和撕裂状况，一直是时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现象。

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头看去，这条路上重峦叠嶂，遍布荆棘。时或星汉灿烂、朝霞开曙；时或乱云飞渡、阴霾蔽日。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致自始至终对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坚定和饱满了他对于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绪。这些都可以从这几卷文字里窥见其大略。所以称大略者，是因为他一生的所有行为、行动，远远多于、大于他留在纸面上的这些文字。尽管如此，对于走近并理解李致来说，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于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诉我们，李致对于如何做人的认知与实践其精神趋向既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规范的，又是受现代革命伦理主义影响的，还是带有某些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成分的。归根结底，李致的做人准则和为人行止，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来说，都符合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标准。

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

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

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

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宇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一戏一招”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的李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在魏明伦遭受极左棍棒打压之时，是李致力排“左”议，抵制“左”风，支持和保护了魏明伦。我觉得，李致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诚，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之外，还含有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这成分，表现为一种现代意味的爱。对

此，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

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 and 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灵魂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其实，归结起来，巴金留给李致的也是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两句话：一句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还有一句是“人总得说真话”。关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和李致对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有极其感人的揭示。这里我只想说明，巴金与李致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就是，巴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巴金对鲁迅的崇敬和追随，无疑更加重了鲁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

量。曾经为巴金辩护从而保护了巴金的鲁迅说过：“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鲁迅是给他们温暖的太阳，也是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在所有进步作家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引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这些青年中，应当也有李致，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关“牛棚”的后期，李致靠“天天读”鲁迅的书获得精神支柱，度过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广大读者由此对四川出版赞誉有加，四川出版事业由此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

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

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热爱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

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

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

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

2018年6月10日

1998年版前言^①

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在出版社工作近十年，出版局工作五年，出版总社工作四年，在宣传部分管出版工作五年。其间有交叉，如任出版局副局长兼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出版总社社长。

在这若干年内，四川出版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在全国率先突破地方出版的“三化”（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针的束缚，改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另一个是分社，既分工专业化，又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局面。可惜不久，我的工作发生变化，以致未能参加分社的收尾（即完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

我十分热爱出版工作，常常与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回顾那一段历史。在一些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把那一段时期我的讲话和短文集中起来，印成这样一个小册子。这些讲话和短文，大多是我根据当时的局党组、社党组的各项决定而讲和写的。如有错误，则该由我负责。翻翻这个小册子，多少可以看出四川出版工作的一些足迹。

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版工作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着新的形势。当年的出版工作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而今已处于社会主义市场

① 此系《我与出版》前言，1998年内部编印。

经济时期；当年人工排字拼版，而今已改用电脑；当年是以新华书店为发行主渠道，而今多渠道发行已经形成，等等。因此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讲话和短文，它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没有变，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即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要取得经济效益——的原则也应该不变。编辑、印刷、发行工作，应当为广大读者、作者服务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发扬。实际上，有些出版部门这方面的工作比过去已有很大进步。

本书供有兴趣的同志翻阅。

1998年8月7日

2013年版前言^①

为保存历史材料，在张京同志的支持下，我于1998年编印了一本小册子《我与出版》。转眼十四年了。

这十四年，我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随笔。有对当年“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回忆，有胡耀邦、杨尚昆、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川版书的关怀，有回忆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被停售前后的过程，有缅怀江明、袁明阮和崔之富的情愫，还有一些讲话和短文。篇目最多的是我与作家的交往。我始终认为，密切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搞好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老诗人冯至当年称赞四川出版人“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对不是“出版商”这个说法曾有过争论，理由是现在是市场经济，图书是以商品形式出售的。我以前说过不在“商”字上搞文字游戏。图书有两重性，既属于商品，又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能简单地以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对社会效益好但发行量不大的图书，或列入公益图书，给予补助；或在出版社内统一核算，以盈补亏；也可自费出书。这是文化积累和传承。至于不当出版官（巴金老人也很强调这一点），就是要与作家和作者交朋

① 此系《我与出版》前言，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友，关心他们的思想、写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为他们服务并发扬他们的长处，包括向他们学习。

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出版社定性为企业，要自负盈亏。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空谈无用，需要探索和创新。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期待并相信当今的出版人会做得更好。

2012年4月4日

目 录

李 | 致 | 文 | 存

我 与 出 版

1998 年版前言 / 001

2013 年版前言 / 003

突破“三化”

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 / 003

我们的一些体会 / 009

积累文化 展望未来 / 014

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 016

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 / 019

附 川版图书出川记 牛 泊 / 023

难忘的经历 / 033

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 / 044

“撞车” / 055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 / 058